

宁夏社会科学院 西夏学译丛 景永时 ◆ 主编
宁夏雪绒花西夏研究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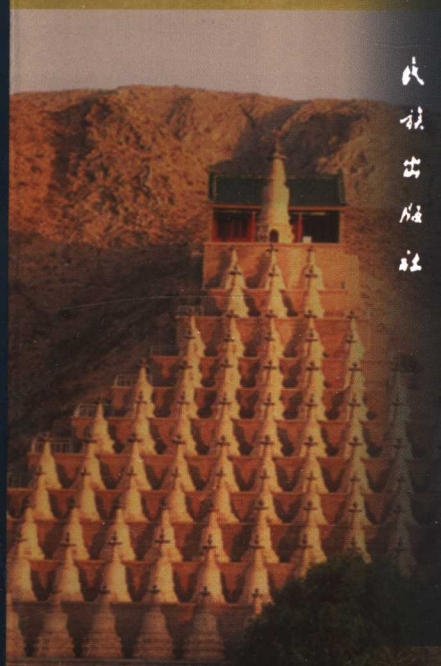
西夏物质文化

崔红芬 文志勇 译

(俄) A·П·捷连吉耶夫—卡坦斯基 著
XIXIA WUZHIL WENHUA



民族出版社





(俄) A·И·捷连吉耶夫—卡坦斯基 著 崔红芬 文志勇 译

西夏物质文化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夏物质文化/(俄)捷连吉耶夫-卡坦斯基著;崔红芬,文志勇译. —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4

(西夏学译丛)

ISBN 7-105-07655-0

I. 西... II. ①捷... ②崔... ③文... III. 物质文化—研究—中国—西夏(1038~1227) IV. K871.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037431号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01—2006—2613

©Vostochnaya Literatura Publishers of the 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 (东方文学出版社),1993

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14号 邮编100013)

<http://www.e56.com.cn>

北京绿冬青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微机照排

北京市艺辉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2006年4月第1版 2006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850毫米×1168毫米 1/32 印张:9.875 字数:256千字

印数:0001-2000册 定价:20.00元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汉编一室电话:64271909;发行部电话:64211734)

本书简介

本书试图对中亚古国——党项人建立的大夏国（公元 9—13 世纪）的物质文化进行描述，重点叙述了西夏的服装、武器、工具、器物、食品和建筑。在撰写过程中，作者除了参考汉文史料的记载以外，还运用了大量的西夏原始材料——辞书和图片，如画像、壁画、艺术品等。它既可供文化史专家及民族学家参考和研究，也可作为通俗读物供大众阅读和了解。

作者简介

前苏联西夏艺术及书籍史学研究学者安纳多里·帕夫洛维奇·捷连吉耶夫-卡坦斯基，1934年出生，1958年毕业于苏联国立列宁格勒大学东方学系，1973年他通过了西夏书籍史学副博士学位论文答辩。1958—1995年在列宁格勒东方学研究所工作。1998年因病去世。捷连吉耶夫—卡坦斯基多年来一直从事对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写稿部收藏的西夏文写本与刊本书籍的研究工作，著有数十篇研究论文和六部专著，其中以《西夏书籍业》（1981年）、《从东方到西方：8—13世纪中亚国家的书籍印刷史》（1990年）、《西夏物质文化》（1993年）等较为著名。在他的著作当中，东方各国的书籍不仅被看作是民族精神的承载体，而且还是民族物质文化的反映和体现。

译者简介

崔红芬，女，1968年6月生，河北河间人，1989年毕业于兰州大学外语系俄语专业，现为兰州大学敦煌研究所在读博士研究生，发表论文20余篇。

文志勇，男，1966年10月生，甘肃兰州人，1989年毕业于兰州大学外语系俄语专业，现为西北第二民族学院组织部干部。

目 录

序言	(1)
第一章 服 饰	(10)
一、制作服装的衣料	(11)
1. 贵重衣料	(11)
2. 普通衣料	(20)
二、男装	(21)
三、女装	(44)
四、童装	(49)
五、头饰	(49)
六、鞋类	(67)
七、某些特殊的服饰	(72)
1. 宗教人士的服饰	(72)
2. 皇帝的服饰	(79)
八、奢华饰品	(86)
1. 制作饰品的材料	(86)

西夏物质文化

2. 饰品·····	(89)
3. 化妆品·····	(94)
九、卫生用品·····	(95)
十、发式·····	(95)
第二章 武器·····	(124)
一、西夏国的军事·····	(124)
二、防御武器·····	(125)
1. 铠甲·····	(126)
2. 头盔·····	(132)
3. 盾牌·····	(137)
三、进攻武器·····	(138)
1. 剑·····	(138)
2. 枪、矛·····	(143)
3. 战斧·····	(144)
4. 圆锤、锤矛·····	(145)
5. 弓箭·····	(146)
四、旗帜·····	(148)
五、军事技术·····	(149)
第三章 用具·····	(157)
一、家畜及畜牧业使用的器具·····	(157)
二、农耕地和农具·····	(163)

三、手工业	(167)
四、家具	(170)
五、器皿	(175)
六、灯具	(178)
七、交通工具	(180)
八、钱币	(181)
九、刑具	(181)
十、小物品	(182)
十一、玩具	(183)
 第四章 食 物	 (189)
一、与食物制作有关的职业	(189)
二、畜牧产品	(190)
1. 肉类产品	(190)
2. 奶制品	(191)
三、农产品食物	(191)
1. 谷物类食品	(191)
2. 蔬菜、水果、食用植物	(193)
四、调料	(194)
五、饮品	(194)
六、粮食制品、面食	(195)
七、甜品	(196)
八、各种菜肴	(196)

第五章 建筑	(198)
一、住所类型	(198)
二、与建筑有关的职业	(201)
三、建筑材料	(201)
四、建筑元素	(202)
五、建筑类型	(204)
六、宗教祭祀建筑	(206)
 后 记	(210)
附录 1: 西夏文词汇索引	(212)
附录 2: 参考书目	(302)

序 言

公元 10 世纪曾建立过大夏国的党项民族在距今 7 个多世纪以前就已经从中亚的版图上消失了，如今对这个民族的历史、语言和文化等方面的研究已成为学术界的显学。借助于古今所编纂的西夏文辞书，使我们能够对那些从黑水城遗址中发掘出的一大批历史、语言、文学、艺术等方面的文献资料进行解读。黑水城是西夏古城当中，惟一经过我们（俄罗斯考古队）仔细考察和发掘过的城市，而不久以前由中国考古学家发掘过的一些西夏城市遗址，其考古成果则要比科兹洛夫（П. К. Козлов）的收获逊色多了^[1]。但是，我们至今对党项人在物质文化方面的情况知之甚少。著名的俄罗斯西夏学专家克恰诺夫（Е. И. Кычанов）在他的学术专著《西夏国史纲》第三章中对西夏的物质文化作了一定的分析和研究，但他主要是依据汉文史料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和研究的。

笔者撰写本书的目的，是想把近年来新近发现的一些有关西夏物质文化方面的资料都尽可能地罗列出来，供学界同仁研究和探讨。

由于我们在西夏国的疆域范围内没有亲自进行过系统而详细的考古发掘，所以在研究党项民俗的时候，主要是依据已经发现

的西夏文献、文物资料，如造像、绘画、书籍插图以及各类西夏文辞书中所保存下来的有关服装、武器、工具、器物等相关资料。目前，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手稿部收藏的西夏文文献有：颂歌集（西夏特藏第 26 号，馆册第 876 号；西夏特藏第 29 号，馆册第 4448 号）、历法书（西夏特藏第 40 号，馆册第 5282 号；西夏特藏第 41 号，馆册第 5868 号；西夏特藏第 43 号，馆册第 7385 号；西夏特藏第 44 号，馆册第 8085 号）、官职封号表（西夏特藏第 45 号，馆册第 4170、41706、4170B、4794、5921 号）、医方（西夏特藏第 53 号，馆册第 807c 号）以及大量的法律条文汇编。但目前对这些材料的研究还很薄弱，仅有其中的一小部分得到了应有的关注。

对历史文化学家来说，有关方面的书籍和插图是最好、最有价值的参考资料。人类的社会、科学以及美学活动的方方面面都是与书籍息息相关，密不可分。^[2] 作为一个民族物质和精神文化的统一体而产生的书籍肯定会反映这个民族文化的发展水平。辞书中出现的有关服饰和器物的名称以及书籍插图对这些事物的描绘等等，都能极大地扩展和加深我们对这个已经消亡了的党项民族的生活习俗和生存方式的了解和认识。

为便于比较，我们认为适当参考那些在西夏国邻近地区上生活的各民族的文化材料是十分必要的，因为从比较学的角度看，邻近各民族的物质文化都是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的。

中亚商业古道上穿梭往来的驼队促进了这些地区之间的接触和交流，使上述地区的文化普遍带有混合的特征。党项大夏国绝不可能是凭空产生的。它周围还生活着中亚及远东地区的一些民族，如汉族、回鹘、契丹、吐蕃等，党项族从这些民族的文化中吸取一定的养份，而这些民族的文化有时甚至会将触须伸到了更深更远的地方，如从古代伊朗和希腊各民族的文化中吸取养份，

而西夏党项文化也对比自己更加年轻而发展相对更晚的蒙古等民族产生了一定的影响。^[3]某些在西夏文当中仅残留有名称的事物，说不定就会在以上各民族的形象艺术和日常生活习俗当中保存下来。因此在撰写本书时，我也适当地引用了一些史料记载（主要是汉文史料记载）和欧洲探险家们在这一地区考察时所发现的文献、文物等资料。应当预先说明的是，西藏地区的考古发现，到目前为止，还很稀少，而吐蕃（藏族）是一个在人类学和语言学方面与党项十分接近的民族，正是由于这一地区在地理位置和政治上长期与其它地区相对隔绝，使其诸多的原本属于中亚古代和中古时期各民族（包括党项族）共有的传统文化因素得以保存至今。关于吐蕃的文献资料，我们可以参阅渥德尔（А. Уоддель）和茨比科夫（Г. Ц. Цыбиков）等旅行家们在 19—20 世纪所撰写的有关论著。

服饰是任何一个民族在物质文化方面的重要体现。历史学家和民族学家都把某一民族在服饰发展变迁方面的历史作为重大的课题来加以研究，这对于他们来说，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第一民族服饰是民族特性的外在体现，也是民族文化特征和艺术欣赏习惯的展现；第二服饰外表款式的差别，与它在劳动过程中的适应程度是密切相关的；第三服饰作为一个客观的衡量标准，揭示了社会发展，尤其是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

就在不久以前，有关东方民族服装历史的研究论著还比较少见。提到这个问题，就应当说一说由科良奇科（С. Л. Клячко）译成俄文、沃尔夫（М. О. Вольф）出版公司于 1911 年出版发行的郭金洛特（Ф. Готтенрот）的著作《外族文化史》。在该书中，对中亚和远东各民族的有关论述被安排在了第一卷的“鞑靼人”一章当中，这个标题显然无法令人信服。^[4]郭金洛特将汉族、吐蕃、回族（东干）甚至是东南亚的一些民族都纳入了突厥—

蒙古部族这样一个大的范畴以内。我不必引述该书的具体细节内容，单说它的插图就问题很多，漏洞百出。它所描绘的中国人都穿着清朝时期的服装。虽然画家也想尽力展现中国当时的真实情况，但插图中还是出现了许多严重的错误，比如说第 101 图中第 9—11 号人物的形象，说明中标注为“朝廷官员”，但图像中的人物连民族属性和时代特征都无法辨别，从他们的服装上所能看到的，只不过是 16 世纪中国服装主要元素的堆砌和强调罢了，画面人物形象都严重地失真和扭曲，但在 20 世纪初这些画在欧洲居然是相当流行，正是它们使欧洲人产生了所谓“中国人”的印象。

在第 108 图第 49 号画面中，画家在 19—20 世纪的一些交通工具旁边画了一辆显然是取材于 16 世纪或更早时期的战车。战车上的战士好像身穿 15—17 世纪的中式盔甲，画面人物形象严重失真，而且竟然具有欧洲画的风格。

尽管如此，该书的价值还是无法抹杀和否定。郭金洛特在这部著作当中几乎囊括了当时欧洲人心目中对东方国家的所有已知的认识。不能因为当时还未知的材料而苛求于作者，而且这部书与其说是面向专家学者的专业论著，还不如说是面向大众的通俗读物，所以不能要求过高。在郭金洛特的著作中，对希腊、罗马人和近东地区的埃及人、亚述—巴比伦人、米提亚人、波斯人、帕提亚人等各民族的服装历史的有关论述，则是非常宝贵而可靠的参考资料。德国的东方学家和古代文化史学家们对以上各民族进行了深入而全面的研究，可谓是一览无余，淋漓尽致。如果说当时的研究还不是那么尽善尽美的话，那么现在随时都可以对这些问题给出一个令人信服的圆满答案。

马克思·吉尔克（Макс Тильке）于 1923 年发表了关于东方民族服装研究方面的论著《东方民族服装发展史论》。^[5]这部著作就显得比较专业和内行多了，但它特别关注的是古代传统民

族的服装，如近东，尤其是非洲各古老民族的服装。德国的非洲学家在这方面的研究遥遥领先，成绩卓著。马克思·吉尔克在其专著中所收录的中亚各民族的服装历史材料，我在撰写本书时也作了一定的参考。

1923年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未见有关东方服装史方面的论著发表，特别是未见到我们所感兴趣的西夏地区的服饰史方面的论著。其后仅有克恰诺夫在自己的论文《汉文史料中关于党项民族的某些记载》^[6]及专著《西夏国史纲》第三章等若干章节中，对西夏的服装及物质文化进行了专门的探讨。^[7]1988年克恰诺夫出版的学术专著《天盛改旧定新律令》中，也间接地涉及到了一些西夏物质文化方面的相关问题。^[8]

由于汉族对党项的影响，其中包括对服饰的影响比较深远，所以本文也适当地参考了Л·П·西切夫（Сычев）和В·Л·西切夫（Сычев）合作撰写的《中国汉族服装——在文学艺术当中的象征、历史及其阐释》一书。^[9]尽管作者在某些方面有可能过分偏重于象征意义的分析，但作者还是详细和专业地分析了汉族服装的有关问题。遗憾的是，他们对中亚各民族的服装却一点也没有提及。

为撰写本书，我利用了П·К·科兹洛夫在黑水城探险时所发现的西夏文百科全书等资料作为基本的参考文献。科兹洛夫所发现的其它书籍，绝大部分是翻译成西夏文的佛经，少部分是法律文书和官职封号表等世俗文献，而这些材料对我撰写这部著作来说帮助不大。

聂历山（Н. А. Невский）确实称得起是苏俄西夏学研究的真正奠基人，他为了编纂夏俄辞典，参阅和研究了大量的俄罗斯收藏的西夏文藏品，如《番汉合时掌中珠》等。他在自己的辞典中还补充了一些他在阅读西夏文文献过程中由他独立解读出的或

是他收集整理出的字、词和完整的表达方式等。在此基础上，1960年苏联出版了聂历山的两卷本遗作《西夏语文学》，这部著作完全可以作为历史资料加以研究。1969年出版了《文海》、《文海杂类》的原文复制本及译文，这就更加充实了聂历山辞典中所包含的内容。

聂历山在撰写《西夏语文学》时，几乎完全采用了《番汉合时掌中珠》中的所有材料。而在我的这部著作中，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才引用这部辞典的有关内容，就是讲到字、词和表达方式的时候，聂历山由于某种原因在释读时将它们忽略或遗漏了的时候，我才会加以引用。

现居丹麦哥本哈根的英国西夏学家格林斯坦德（Эрик. Гристед）出版过一部附有两卷西夏文辞典的著作《西夏文字分析》，他在著作中宣称他破解了一些别人至今尚未能破解出的西夏文词汇并确证了一些已知的西夏文词汇的意义。^[10]我在撰写本书时，在很多地方也参考了他编纂的这些辞典。

克恰诺夫曾经对世界上珍贵而绝无仅有的西夏文文学作品《对联、格言新集》（或者叫《新集锦合辞》）作过深入的研究。在翻译出版该书的时候，他将原文也一并作了复制和刊布。克恰诺夫翻译的重要性在于，在这部书中所遇到的一些名词，在西夏日常生活中原本是很普通的名称词，但在具体的上下文关系中却有了新的意思和解释，而有时候上面所提到的那些辞书当中却没有收录过这些词的这些新的意思。对联、格言给我们以新的认识，即具体事物的名称词在这种或那种具体的环境中该如何使用，从而丰富和拓展了这些词汇所涵盖的意义。

本书中出现的所有西夏文的字、词和句等，我把它们按照主题分作单字、双字词和多字组合以及整句的形式统一编在一起，作为附录《西夏文词汇索引——小辞典》（简称“索引”）呈现给

读者。而在词的内部结构的划分上，则是按成分构成的原则来划分。克洛克洛夫教授（В. С. Колоколов）就是依照该原则，出版了他的西夏文辞书类著作《文海研究》、《文海杂类研究》。这个体系在本质上与瓦西里耶夫（В. П. Васильев）和罗森彼尔克（О. О. Розенберг）所采用的研究方法近似，它是从西夏字的下半部分或是右下部分入手对整个字进行分析。附于本书末尾的《西夏文词汇索引》也采用了这个原则。

另外，还应当讲一讲对西夏文字的分析方法。辞书《文海》中所采用的方法，是力图用与被解释的字、词形状相近的字、词来解释该字、词。这种方法在很大程度上都能较为准确地解释一个字、词的意思，但有时候《文海》的解释对我来讲并不是很有意义，它对某些词的解释要么是意义不明，要么是毫无意义，有时甚至是十分荒谬可笑的。比如说有一个表示“特别漂亮”意思的字，却被它解释为：字的左半边是“鸟”，右半边是“秃发癣”！这个字就很能说明问题了。由于在辞书中与被解释的字在发音上相同的前一个字和后一个字中也都包含有这样一个共同的成分“𐵇”，所以这个字解释起来就容易多了。

但是，同时也存在着另外一种对西夏字的分析方法，即以西夏字内各个部分所承载的语意为基础对它进行分析。克恰诺夫在他的《列宁格勒东方学研究分所馆藏西夏文文献中新近发现的西夏文辞典》^[11]及《西夏文结构研究》^[12]等论文当中就列举了这样一些有着独立意义的成分字。

虽然笔者个人认为第二种从字的各部分所承载的含义入手来研究整个字义的结构分析法更为正确一些。但是西夏人当时所采用的第一种方法也应当让读者有所了解。因此笔者在本书中分析每一个字、词的时候，既考虑到了《文海》编者所用的方法，又考虑到了它各组成部分的基本含义。按《文海》的方法加以确认

的西夏文词汇，都列入书中的《西夏文索引》。放在方括号中的汉字是西夏文的汉文拼读法。文中所遇到的汉字也列入了附录中的《汉文词汇索引》（中译本略去——译者注）。

当然了，由于本文内容的局限性，只列出了一些西夏文当中的名称词，随着对西夏文辞书、手稿的深入研究和今后新材料的不断发现，无疑会不断扩展各个主题所涉及到的字、词和表达方式。

西夏考古学本身是一门相对年轻的学科。对西夏文物、陵墓等古迹的发掘情况，在陈炳应的《西夏文物研究》^[13] 和史金波的《西夏文化》^[14] 等著作当中都有记载。这些书籍中包含了大量的图片资料，大大丰富和拓展了我们对西夏党项族物质文化的有关知识。

注 释：

[1] П·К·科兹洛夫：《蒙古、安多及黑水死城》[П. К. Козлов, “Монголия и Амдо и мертвый город Хара-хото”], 1923 年，莫斯科-彼得格勒；Е·И·克恰诺夫：《西夏语发音》[Е. И. Кычанов, “Звучат лишь письменна”], 1965 年，莫斯科；Е·И·鲁勃-列斯尼钦科和Т·К·沙弗拉诺夫斯卡娅合著：《黑水死城》[Е. И. Лубо-Лесниченко и Т. К. Шафра-новская, “Мертвый город Хара-хото”], 1968 年，莫斯科。

[2] С·П·鲁波夫：《综合科学规律框架下的书籍史，写本和刊本书籍的有关问题》[С. П. Луппов, “История книги как комплексная научная дисциплина. Проблемы рукописной и печатной книги”], 1970 年，莫斯科，第 4 页。

[3] Е·И·克恰诺夫：《西夏国史纲》[Е. И. Кычанов, “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 тангут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1968 年，莫斯科，第 323—330 页。

[4] Ф·郭金洛特：《外族文化史》[Ф. Готтенрот, “История внешней культуры”], 1911 年，圣彼得堡，第 176—201 页，图 100—116。

[5] 马克思·吉尔克：《东方民族服装发展史论》[Max Tilke, “Studien zu der Entwicklungsgeschichte des orientalischen Kostüms”], 1923 年，柏林。

[6] Е·И·克恰诺夫：《汉文史料中关于党项民族的某些记载》，载《苏联民族学》[Е. И. Кычанов, “Некоторые сведения китайских источников об этнографии тангутов”, Советская этнография], 1959 年第 4 期，莫斯科。